



在平阳冠尖山 我缅怀爷爷何霖

□胡宏伟 口述 程望槐 文

今年,省委隆重举行纪念省一大召开80周年系列活动。7月23日,我作为省一大代表何霖后人的身份应邀来到平阳县凤卧镇省一大陈列馆会议室,参加由中共浙江省委主办的纪念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八十周年座谈会,这既是我爷爷的光荣,又是我们作为革命前辈后人的光荣。



爷爷何霖(前排左四)与胡岩岁(前排左三)合影

小山村燃起革命火炬

有党史专家形象地说,浙江境内山高不过冠尖、水深不过南湖。一个个史实雄辩地证明,省一大留下的红色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昭示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宝贵财富和力量源泉。

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儿女的前行开辟了一条道路。而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县凤卧乡的冠尖山上拉开了序幕,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是浙江党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行程万里,初心不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之际,深入了解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和老前辈为革命事业付出的努力,是重温初心的精神洗礼,是薪火相传鼓劲扬帆的再次出发。

平阳县素有浙江延安、浙南红都的美誉,是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红军挺进师的活动中心。平阳是浙江省新四军发源地和全国策源地之一,刘英、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平阳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凤卧镇冠尖山上,有一座建于1932年的五开间二层木楼,当地人俗称新楼,屋主是郑永暖。郑永暖读过私塾,思想进步,拥护革命,这座新楼便成为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1939年7月,省一大就在新楼召开。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省一大在平阳县凤卧镇的冠尖和头马岗两地召开,来自省委机关的刘英、薛尚实、汪光焕、吴毓、丁魁梅;浙南特委龙跃、林辉山、郑海啸、陈平、孙经邃、孙绍奎、刘发美;宁绍特委杨思一、王文祥、谢廷斋、魏文彦;台属特委郑丹甫、周义群、林尧;金衢特委林一心、王明扬、何霖;处属特委张麒麟、周源、傅振军;浙西特委的有顾玉良等26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80年前,26名代表借着半人高的茅草隐蔽,沿着崎岖的小路摸索上山。那一年,爷爷何霖时任兰溪中心县委书记,与林一心、王明扬作为金衢特委选出来的代表参加大会,到平阳辗转花了一个月时间。据爷爷的口述,每位代表都乔装成教师、商贾赶路。行动之隐秘,以至于他们出发前都不知道具体地点,直到抵达平阳县才拿到会址地图。虽然开会时间在白天,但为了防止暴露,房间里的窗户和门都要关上,代表们就靠着一盏油灯开会。

为了保证省一大顺利召开,凤卧镇家家户户都驻扎着红军,老百姓家里如有闹腾的家畜,也会宰杀或驱赶,与会的代表们分散住在农家里。大会持续10天,期间转移了两次。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和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国际国内形势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统一战线问题》《职工问题》《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提纲》《对青年群众团体的领导问题》《妇女工作问题》以及《告全浙民众书》等一系列文件。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浙江省委班子:书记刘英,常委汪光焕、薛尚实;委员龙跃、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刘清扬、顾玉良;候补委员杨思一、林一心。大会还选举刘英、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顾玉良、郑丹甫、林一心、杨思一、丁魁梅、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美等12人为浙江省出席党的七大的正式代表,林尧、谢廷斋等3人为候补代表。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加强了浙江党的领导,巩固了党的组织,鼓舞了全省党员干部的斗争热情和信心,使浙江全党空前统一,因而在浙江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意义。

革命前辈的红色足迹

我的爷爷何霖原名胡岩岁,曾用名胡甘霖、胡墨,1909年出生于浙江永康胡库上村。16岁开始在上海应永顺翻砂厂、上海三友实业总厂当学徒。1930年,家乡永康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农民暴动,但暴动很快失败,家乡的许多进步分子到上海避难,何霖倾其所有全力资助他们,甚至借债来帮助这些勇敢而又无畏的乡亲。

何霖不怕受牵连,真诚地帮助家乡的赤色分子的行为,受到党组织的关注。1931年5月,22岁的何霖在上海由楼其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交通员,回永康恢复党组织,建立了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永康县工委。何霖回家乡不久,组织了农委成员和群众开展分粮行动,打死一个恶霸地主,国民党派队伍弹压,何霖等人只能转入地下,开展隐蔽斗争。

1932年10月,中共永康中心县委重建,何霖任书记,下辖2个区委、39个党支部。中心县委派人联络永缙山区的红三团余部,建立了永康游击队。12月30日,王振康率游击队夜袭芝英警察分局,击毙分局长,缴枪12支,子弹300余发。1933年1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县委委员3人以及20多名游击队员被捕。当时,何霖因恰巧在另一地开会而脱险,何霖的家中被抄,其父被抓进大牢,备受毒打。何霖因受通缉,来到上海,在中共上海局任政治交通员。

1933年3月,何霖受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派遣再次到永康,重新建立了中共永康县工委。同年秋天,在何霖的指导下,中共东阳中心县委成立。1935年12月,因叛徒出卖,何霖在金华被捕。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获释。刚出狱的何霖急于寻找党的组织,何霖与早年参加革命的同村人胡济涛结伴赴延安寻找党中央,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询问情况时,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们:新四军已经成立,即将在皖南集结,干部奇缺,你们是浙江人,希望你们回浙江参加抗日斗争。并出具手续,还给予路费。

1938年2月,何霖和胡济涛回到家乡后,创

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在纪念省一大召开80周年座谈会上,省委书记车俊深情地说,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浙江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前仆后继、浴血奋斗,传承红船精神、勇立时代潮头的历史。

车俊强调指出,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留下的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永远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要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永怀赤子之心,永葆奋斗激情,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座谈会后,我们参观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列馆。走进陈列馆,一幅幅珍贵照片和一件件红色器物,向访客诉说当年在这片大地上发生的红色记忆。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展览馆里还新增了省一大全体代表的等身铜像,我连忙找到爷爷胡岩岁的铜像,并请人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我还和党的七大代表、省一大代表、原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孙子刘红宇,党的七大代表、省一大代表、原金衢特委常委林一心的儿子林晓

办了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方针的《民众壁报》(后改为《抗卫报》)。组织上对何霖被捕入狱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认为何霖立场坚定,虽屡受重刑而未泄露党的秘密,于1938年3月给予恢复党籍。

1938年3月,成立了中共永康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何霖担任委员。5月,在中共金衢特委常委林一心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新的永康县委,何霖任县委书记。1939年2月,何霖调任中共兰溪中心县委书记,并出席1939年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国民党加速反共,中共浙西特委下属多数县委被国民党破坏,一批同志被捕,许多同志牺牲,中共浙西特委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搜查。由于环境恶化,组织决定派何霖到皖南东南局党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苏皖区党委派到太湖地区。1941年1月,抗日时期的首届中共宜兴县委成立,何霖任组织部长。

1945年10月,苏南新四军北撤,何霖服从组织决定,奉命留守。担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宜北留守处主任,兼任宜北地区武工队队长。何霖和武工队员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武南蒋家村、小河村及宜北闸口老鹅窝村、十里牌杨家村等多次遭国民党暗探告密而被袭。何霖在战友们的掩护下虽然多次突出重围,但复杂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损害了何霖的健康,有时黑夜行军根本看不清地面,头晕眼花时无法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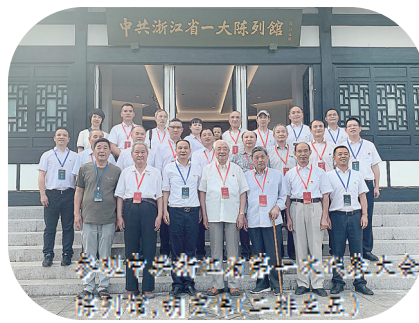
1946年7月,组织派何霖到中共苏华中局党校学习。1946年9月至1948年7月,何霖在江苏、山东积极参加支前工作,先后任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民站巡视员、运粮科长、山东省粮食总局粮政科长等职,亲身经历了保卫两淮及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等,荣立支前二等功。1948年8月,何霖任华东财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上海解放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人事处副处长、上海医学院党委监委、上海焦化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党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82年离休,1988年3月病逝于上海。

歧在省一大陈列馆合影留念,共同追寻革命先驱的红色足迹,共同感悟红色精神,共话改革发展的美好前景,深感荣幸。

岁月飞逝,薪火相传。潜移默化中,爷爷成为我心目中的灯塔,一直指引着我向前走。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的红色传统。我是胡库村的一名党员,也是永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永康市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永康市和谐思想研究会

的会员,并加入红色基因寻访团微信群。我多次参加研究会组织的活动,遍访革命老区,追寻革命前辈足迹,慰问革命烈士后代。

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解放祖国,为了给人民谋幸福!我要时刻牢记爷爷的教诲,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要当好革命传统教育的宣传员,多讲讲革命前辈的红色故事,多收集整理回忆录,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当好关心革命前辈家属的贴心人,多参加一些送温暖活动。要当好革命老区建设的热心人,尽己所能为推进乡村振兴与老区振兴、红色引领与绿色崛起作出新贡献。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列馆